

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	黃 雍 (1)
復興社述略	蕭作霖 (21)
關於國民黨官僚資本的見聞	祝世康 (72)
短篇十篇	
徐錫麟槍殺恩銘見聞回憶	王迈常 (89)
浙路收歸國有的內幕	許炳堃 (91)
袁世凱軼事數則	吳弱男 (92)
孫中山先生創辦上海《民國西報》的經過	張祥麟 (94)
民初兵工見聞雜憶	吳承禧 (96)
民初清室向銀行抵押的一批文物的遭遇	胡仲文 (97)
略談中山艦事件	方鼎英 (99)
郭松齡反奉時奉軍和日本的勾結	湯國楨 (100)
皇姑屯炸車案側聞	張聯棻 (102)
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回憶	劉翼飛 (102)
回憶川軍反對袁世凱的鬥爭	但懋辛 (105)
日本兩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	王家楨 (127)
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	岳松生 (132)

附 載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一年的工作報告	(155)
---------------	---------

附注

对《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一文的补充

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二四页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三页

对《徐锡麟枪杀恩铭见闻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六页

对《袁世凯轶事数则》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十八辑二二五、二二八页、第三十一辑

二九七页

对《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国西报〉的经过》一

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

八页

对《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七页

对《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二七、二三一页

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

黃 雍

一九二四年一月間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孫中山先生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親手創辦了黃埔軍校，來培養新型的革命幹部。在民主革命運動開始高漲的形勢下，全國各地青年憧憬革命，紛紛投筆從戎，來到黃埔。這個黃埔小島上，當時真是風雲際會，革命的空氣非常濃厚，正如黃埔校歌上所說，“怒潮澎湃，紅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但是這個“革命搖籃”一開始就存在着革命派和反動派的矛盾：一方面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又有以蔣介石為首的許多革命投機分子和反革命派系（象戴季陶、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分子謝持、鄒魯等）。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鬥爭也日益尖銳。黃埔左派學生中最初出現進步政治組織——火星社，在校內的西山會議派及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鬥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隨後，在一九二五年底，青年軍人聯合會在共產黨領導下成立以後，同孫文主義學會的鬥爭更加劇烈。蔣介石發動三二〇反革命政變前不久，即借故迫令青年軍人聯合會解散，孫文主義學會亦同時取消，另行組成一個完全由蔣介石自己控制的黃埔同學會。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黃埔同學會就完全被反革命力量所控制，成為蔣介石鎮壓人民和革命勢力的工具。蔣介石竊取了政權，建都南京以後，黃埔學生氣焰

日益嚣张,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以至当时有人指为“黄虫”、“黄祸”。在这种情况下,各旧軍閥部队的軍官人人自危,于是由呂超等发起恢复四校同学会,以謀合力对付黃埔势力。 蔣介石为緩和当时矛盾,消除后患計,又命令取消所有軍事学校的同学会,并将黃埔同学会名义同时取消,另在中央軍校內設一同学調查科,負毕业生登記調查考核之責。此后黃埔学生又走入小宗派的全盛时期,几乎是人人称霸,个个出头。蔣介石为了加强对黃埔学生的控制和利用,一面将黃埔同学会組織形式恢复,改称为中央各軍事学校毕业生調查处,一面效法墨索里尼,筹謀建立法西斯組織,借以統一小宗派紛歧的黃埔力量,并且把它伸展到青年学生和全国其他各个方面中去,实行法西斯統治。所以他首先根据自己的所謂“力行哲学”組織了力行社,作为“中正式的法西斯組織”的中心,然后以合作經濟組織形式組織了厚生消費合作社,以謀建立独立的經濟組織。为了扩大影响,发展力行社組織,蔣介石又成立了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外围,并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时戴笠所建立的特务組織并入复兴社。可是这些法西斯組織越发展,内部矛盾也就越多:首先是复兴社与 CC 团的火并,其次是戴笠的特务系統与徐恩曾的特务系統各不相容,鬧得烏烟瘴气,冲突时起。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二次合作,蔣为掩盖自己的罪恶面目,对中共表示“誠意”起見(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自己的内爭),下令解散复兴社和 CC 团,另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青团在各地狐假虎威,鬧得民怨沸騰后,一九四六年蔣又把它与国民党合并。从此,三青团的全体干事、监事搖身一变而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員。这一幅新的升官图的展开,使各派系皆大欢喜,暂时满足了羣狼爭食的要求,同时也把蔣經国的力量伸展到国民党中去。

以上所述，是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的變遷以及後來反革命派系演變為特務組織的一個簡單輪廓，下面再逐一加以分述。

火 星 社

黃埔軍校成立時，中國共產黨曾先後派了一部分黨員參加校務領導工作和一部分黨員參加受訓，但人數不多，難於適應當時工作發展的需要。這時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黨在軍隊和軍校中組織的發展受到嚴格限制，而羣眾革命情緒高漲，又迫切需要組織起來加以團結教育。因此，由一部分共產黨同學和一些同情黨的同學效法列寧在一九〇〇年創辦《火星報》的意義，組織火星社作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來推行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並為吸收黨員作些準備工作。

火星社是當時黃埔軍校內唯一的革命組織，成立的時間約在一九二四年底，其時周恩來同志已到校擔任領導工作，第一期學生已將屆畢業。它是由第二期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李勞工、周逸羣、王伯蒼、吳明（即陳公培）、蕭人鵠、吳振民、陳恭、謝宜渠等倡議組織的。參加這組織的人除當時在校一部分共產黨員學生外，還吸收了一部分接受共產黨影響較深的左派學生。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前後，參加火星社組織的人數，第二期學生有六十餘人，第三期學生約三十人左右，軍官佐中參加的人數甚少。

火星社成立不久，在一九二五年初，國民黨黃埔軍官學校特別黨部進行改選（國民黨在各軍校皆設有特別黨部）。火星社運用自己的組織力量展開了競選運動，結果按照自己的預定計劃獲得完全勝利。當選為特別黨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有周逸羣、王伯蒼、吳明、陳作為、羅振聲（不久脫黨）、黃錦輝（候補執行委員，旋即

加入共产党)等人,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蒋介石仅得六十票,没有当选,后来由党代表廖仲愷推荐,才得当了一名监察委员。

火星社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为全校民主创了一个先例,同时也震惊了蒋介石及校内反动派。后来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把这件事作为反共的借口,说成是“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扩张势力”。

同年九月,黄埔第二期学生毕业离校,火星社亦随之解散。参加组织的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均已先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火星社活动的時間总共不到一年,但在对当时校内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五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危,黄埔同学聞訊,人心頗为不安。西山会议派分子乘机造謠煽动右翼分子合謀反共。他們宣揚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反动理論,企图假借孙中山学說思想为号召,組織反共集团。他們以小宗派为中心,以第二期学生作为发展組織的重点。如以謝廷獻、謝純菴、楊引之为首的川籍同学約二十余人,均与西山会议派有关系,反共最激烈,后来都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此外,史宏燾、楊耀唐、謝振邦等以江西同乡为活动目标,李士珍、周兆棠专聯絡浙江同学。他們彼此串联,互相声援,使一些中間分子囿于反动势力,不敢有所表示。当时左派同学因受《向导》和《中国青年》两个革命刊物的影响,对中国革命已有初步的認識,进而追求革命真理,研究馬列主义,逐漸傾向共产主义,从而他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更加團結一致了。在这种情势下,黄埔学生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立就更加鮮明了。

• • •

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前数日，蒋介石集合一、二期学生在校本部举行聚餐，说明东征的意义。席间发现了油印文件，内容大意是：为了“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要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文件是由贺衷寒起草的）。他们在校内由贺衷寒、曾扩情、潘佑强、伍翔、杨引之等负责，在校外由甘乃光等出面，上海由戴季陶直接领导，分头进行活动。这是孙文主义学会酝酿和组织的最初阶段。

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閔）叛乱，到廖仲愷先生被刺前后，在这一段期间内，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逐渐形成。各军中左右派的磨擦日益尖锐；在黄埔二、三期学生中斗争尤为剧烈，打架冲突，时有所闻。当时二期四川籍同学多与谢持、石青阳等西山会议派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极端反动的集团。他们常常气势汹汹，找共产党员周逸群、王伯苍、吴振民等为难。幸周、王等人比较老练，力求避免无原则纠纷，因而没有酿成重大冲突。这些反动分子还常在深夜偷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并用种种卑劣手段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在潮汕的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趋表面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驻潮汕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反共积极分子筹备正式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同时共产党也开始发展组织，于是针锋相对，斗争十分尖锐。当时驻潮汕的第一军全部军官军佐有十分之二参加了共产党，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均居要职，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等皆是（贺衷寒那时不在潮汕）。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分子内部因权利之争也有矛盾，如冷欣、孙元良、倪鹤等人反对繆斌、徐锡林，斥繆为“叛徒”，为“共产党奸细”；斥王俊、何玉书、王祿丰等为“动摇分子”。直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孙文主

义学会在潮汕方面的活动才渐趋沉寂。

青年軍人联合会

青年軍人联合会的組織是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要求而成立的。当时在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的粤、桂、湘、滇各軍为了謀求本身势力的发展,各設有軍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并抽調自己部队中青年干部加以訓練。上海五卅大惨案发生后,广东工人阶级为声援上海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省港工人的英勇斗争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使广东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莫大的鼓舞。在各个軍校受訓的青年在这种革命形势激盪之下,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現的高貴革命品质和坚决的斗争意志所感染,革命情緒更加熾烈,要求共产党帮助和教育的愿望也更加迫切。黃埔軍校的革命派同学为了适应这些青年軍人的要求,在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以軍校特別党部名义派第二期工兵队学生王一飞(后为共产党员)为代表,到广州經常参加广东的工、农、商、学、兵各界的联系會議,还与粤(李福林部)、湘、滇、桂各軍所办的軍事学校学生取得密切联系,同时发刊小型月刊《青年軍人》。这就是青年軍人联合会活动的开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組織形式和具体的活动方針。到是年九月間黃埔軍校第二期学生将届毕业时,經共产党組織决定,派第二期輜重队学生周逸羣担任青年軍人联合会的工作。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青年軍人联合会的組織規模粗具,开始有綱領、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当时活动范围主要在黃埔軍队本身,并兼向駐在广东境内的第二軍(湘軍)、第三軍(滇軍)、第四軍、第五軍(均粵軍)、第六軍(程潛部)各軍中扩大影响,发展組織。至此,青年軍人联合会已成为軍队方面团結革命派軍人的唯

一組織，对各軍中以西山會議派和国民党右派为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革命活动，展开了尖銳的斗争。

青年軍人联合会成立以后，在一年多的時間中，其組織已遍于广东各軍，并向国内各軍寄送刊物，扩大影响。由于青年軍人联合会工作深入，当时駐粵各軍风气为之一变。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为了挽回他們的失敗局面，故意在羣众中制造和扩大糾紛，企图借此来加强反革命勢力的内部团结，爭取蔣介石對他們的支持。蔣介石固敌視青年軍人联合会在青年軍人中的組織活动，亟思拔去这一眼中釘，而对孙文主义学会虽賞識其反动活动，但認為这一組織究竟非自己亲手培植，恐将来难于切实掌握。因此，在三二〇事变前不久，蔣介石就借口青年軍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間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誠”的校訓，迫令青年軍人联合会解散，同时为表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精神，亦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并另行組織黃埔同学会，由他自己直接領導。

黃 埔 同 学 会

蔣介石在解散了青年軍人联合会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以后，为了排除共产党与西山會議派，將黃埔同学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决定另組織“黃埔同学会”。于是他指派蔣先云（共产党员，校长办公室秘书）、曾扩情、賀衷寒、冷欣、余洒度、賈伯涛、伍翔、楊引之、李之龙、潘佑強、田載龙等为黃埔同学会筹备委員，并自任会长，意在实行“一軍一党，以軍制党”的預謀。黃埔同学会内部組織設有組織、宣传各部，在各軍中設立分会和基层小組，另設撫恤委員會办理伤亡同学优撫事宜。会址設于广州东較場国民党中央党部內。这是蔣介石控制黃埔学生作为一己工具的开始。自

后随着北伐軍事的进展,黃埔学生到达那里,这一組織就发展到那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国共分家,黃埔同学会从此就完全掌握在右派学生手中。当时大江南北,到处皆是“五皮主义者”(五皮指皮帶、皮靴、皮鞭、皮包、皮裹腿,是当时黃埔学生最时髦的装束)的天下。这时黃埔同学会的組織已成为蔣介石对付异己、摧殘革命的有力机构了。

蔣介石在背叛革命,篡夺了政权后,由于大量扩充和收編軍隊的結果,在軍隊中形成两大系統:一为他自己的嫡系中央軍,一为收容改編的杂牌部队,而在数量上,中央嫡系又弱于杂牌部队。他就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丁的手段来操縱駕馭,并决定調整改編杂牌部队,因而使杂牌部队的軍人感到人人自危。这些軍人見到黃埔系統有同学会組織,既能团結发展,又可暢所欲言,于是有四川呂超(以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參軍长)等旧軍事学校出身的軍人,乘机以团結自存为号召,发起恢复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之四校(将弁、陸小、陸中、保定軍官)同学会組織,作为他們自己的政治資本,借謀与蔣抗衡。呂等发起后,响应者大有人在,最积极的莫如江西张岂庸,而广东的陈銘枢和湖南的唐生智亦表同意。当时他們的声势頗盛,大有压倒黃埔軍人之势。蔣介石认为如任其組織成功,将为心腹之患,因而他就来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以总司令名义下令禁止軍隊中有分散团結的同学会、同乡会等組織。他在表面上首先命令取消黃埔同学会,但实际上不过将黃埔同学会改头換面,在中央軍校內設立一科,专司黃埔学生調查登記事宜,名曰中央軍校毕业生調查科。这个科另立門戶于南京的明瓦廊三道高井,設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揮,并保留原来的撫恤委员会,由是黃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

中央各軍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

当南京政权初定,蔣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統治,就以統一軍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軍事学校,来訓練他所需要的干部。因此,各兵种均設有軍官学校,如中央陸軍軍官学校、空軍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騎兵学校、輜重兵学校、宪兵学校、海軍、魚雷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等,各校在各地还設有分校。除此而外,还有因人因事而設的各种短期訓練班等。所有各校校长一职均由蔣介石自兼,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为了統一軍事教育,实則为法西斯教育的雛形。軍事学校漫无限制发展的結果,学校名目繁多,据一九三五年統計,訓練单位就有百余个,而以一小小軍校調查科实难胜任这些川流不息的毕业同学的組織、調查、登記、考核等工作。同时,这个調查科又由于职权范围所限,在各軍校毕业生的分发調度上亦难以应蔣介石运用自如的要求。这时各軍事学校又有組織同学会的情事,如杭州的空軍学校政治部主任蔣坚忍就倡导組織空軍学校同学会。事为蔣介石所悉,即严厉訓斥該校师生不得破坏团結,并传蔣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但此事发生后,更促成了蔣介石改組扩大調查科的决心。不久他即將調查科改組扩充为中央各軍事学校毕业生調查处,名义上改隶于軍事委員會(后又改隶軍政部),在各軍、师单位和各省、市普遍設立調查分处,其經費由各隶属机构列为正式預算,各軍、师、省、市分处負責人由中央处聘任。他又將以前所有各种訓練团、队、班等訓練机构共百余单位的受訓學員,一律加以甄別,按毕业時間之先后,重新編配,并入中央軍校各正式期班,享受正式期別待遇。如在广州的政治訓練班与六期同时,就編入軍校第六期,作为正式

第六期生看待。至此，黄埔同学会实质上不仅重新恢复，而且较前更为发展，只是在名义上有所不同而已。蒋又将抚卹委员会取消，其抚恤业务由调查处办理，并规定调查处有介绍或呈请分发失业同学工作之权。

九一八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要求，仍然坚持“剿共第一”的方针，并且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剿共必先集中各军意志”的反革命口号。他除自己坐镇南昌主持“剿共”军事外，叫邓文仪在南昌行营中成立调查课搞军事情报和特务活动，以辅自己耳目所不及。又命陈诚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将全国各军高级将领分期分批集中轮训。训练的目的在于：动员全国军事力量一致“剿共”；训练的措施是：灌输“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宗旨。训练团学员毕业时由中央毕业生调查处依照毕业生登记手续发给同学登记证，证明已取得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的资格。这样，所有受过训的高级军官也就都成为蒋介石的“学生”，同时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又可扩大其控制范围，深入到各个非嫡系的杂牌部队进行活动。抗战时期在重庆浮图关举办的中央训练团，后来选训人员由单纯的军人扩展到行政各部门人员。这些非军人的员生，毕业后也均归口于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这样一来，这个调查处的活动范围更从军队部门扩展到各个行政部门中去了。这个训练机构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

争权夺利的小宗派

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贯漫无限制地发展军事学校，以培植其反动军事爪牙。中央各军校除本校外，又在武

汉、长沙、西安、桂林、成都各地设立分校；各分校中除正式期别外，还设立若干短期训练班。由此，军校毕业生日益增多，而失业的学生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兼之，各部队贪污吃空之风盛行，每师规定人数约一万二千人，实则最多不到八千人，甚至只有四、五千人。各部队长为便于营私舞弊，都各自在部队中排除异己，形成了封建小集团，所需干部均由自己队伍内选拔训练。因此，中央毕业生调查处呈请军政部分发到各部队的同学，每每经年得不到实缺，反而借故被排走。当时以南京一地而论，失业同学动过千人，打架闹事，时有所闻。斯时的调查处实际上成了失业同学的救济处，排难解纷成为唯一的业务。这种循环失业状况已成长期不治之症。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央训练团迁南京孝陵卫时，还演出了一场中央训练团内的黄埔学生齐集中山陵哭灵的活剧。

虽然蒋介石竭力用种种方法企图统一黄埔学生的思想，控制黄埔学生的意志，并且在形式上统一和加强了黄埔同学的组织，但其结果仍然是枉费心机。黄埔学生中由于权利之争，形成了许多小派系：鄧悌（驻德武官）以留德、法、意、比学生为基础，与唐纵（驻德副武官）顾希平（留法）、刘璠（留比学警察）、汤武（留意）等人结合，组织留欧集团。他们自以为在德意等国留过学，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懂得较多，就向蒋献计，仿德、意先例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正暗合蒋介石之意，鄧悌得蒋欢心，获任复兴社书记，实种因于此。不甘寂寞的贺衷寒又想重温孙文主义学会的旧梦，以张镇（宪兵司令）、萧赞育、邓文仪、刘詠尧等为骨干结成留俄派。以袁守谦（政训总处秘书长）为中心的政训系统也加强了组织。潘佑强、周复、杜心如、彭孟辑、李一民等则结成留日学生小集团。康泽则以北伐时宣传大队为基础，以三期云、贵、川籍学生

韓文煥、毛嘉謀、雷清尘、賀明暄等为中心，成立西南社。戴笠借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机，以調查敌我军队内部情况为名，向蔣献策組織十人团，由此发展成为特务組織。刘健羣当时充何应欽秘书，又借何的关系，上书蔣介石建議組織藍衣社。这一羣乱世妖魔，在互相攻击、相互爭鬭的斗争中，把整个南京城鬧得烏烟瘴气。

力 行 社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蔣介石由于自己的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把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奉送給日本，引起全国人民的憤怒和反对，一致要求他改变其卖国政策，积极抗日。与此同时，蔣介石的独裁統治所凭借的黄埔力量，也是問題重重，危机潛伏。他的嫡系军队貪污腐化之风盛行，逐漸走上北洋軍閥部队的老路，对他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使他无法貫徹自己一意孤行的意志。而最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則是他一手培养起来在政治上活动的一些黄埔学生，派系紛歧，互相磨擦，各不相容。当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蔣介石不但对在淞沪抵抗日軍的十九路軍不予积极支持，甚至当他的嫡系部队八十七师宋希濂率全旅官兵齐集南京尧化門自动开赴上海参战时，也多方留难。最后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派八十七师王敬玖部和八十八师俞济时部組編第五軍，派张治中充軍长，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不料八十八师开抵昆山南翔前綫，与敌一触即潰，調赴后方常熟整訓时，全师官兵不到四千人。蔣介石接戴笠报告后大为震惊，对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命运所系的黄埔系統力量的前途不得不从新考虑，以加強控制。于是他除了决定把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把国府主席社与林森，而自己則退居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借图轉移空气、和緩全国輿情而外，又提出“党权高于一切”、

“以党治国”等口号，以防大权旁落。他一面令戴笠加强特务组织，成立特务处于南京鸡鹅巷；一面接受鄧悌的建議，以他自己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法法西斯組織，成立力行社，自任社长。力行社組織形式完全采取集权制。社以下設若干小組，每周在蔣介石的官邸(軍官学校內)召集組长联席会议一次，由蔣自己讲解“力行哲学”，并研究德、意法西斯組織形式和发展等問題。力行社参加分子除以黄埔学生中的政治干部为基础外，并吸收一部分文人和留学生，但不吸收在部队服务的黄埔学生参加。他又将駐意公使刘文島升格为大使，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蔣緯国送德留学，并調回大批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法西斯組織工作。当时参加这一核心組織的人有：鄧悌、賀衷寒、桂永清、袁守謙、邓文仪、刘詠尧、萧贊育、黄雍、顧希平、滕杰、冷欣、蔣坚忍、曾扩情、周复、杜心如、陈紹平、易德明、李一民、彭孟緝、康泽、严不严、梁干乔、余洒度、郑介民、戴笠、俞墉、张輔邦、田載龙、唐纵、潘信強、刘健羣、范汉杰、孙元良等約五十余人，并决定这一組織为核心組織，不再发展；另由軍校毕业生調查科出面組織厚生消費合作社，作为外围，发展組織。但这个外围組織因政治性不强，发展有限，后又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同志会，亦即中华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正式外围组织。

复 社 兴

复兴社社长由蔣介石自兼。下設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事会，并各設常务干事若干人，組織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設書記长一人，秉承“領袖”意志处理一切日常会务。下設書記处、組織处、宣传处、軍事处、訓練处、特务处。各省市設分会，机关团体設支会。支会下分小组，为基层组织。

第一任書記長經蔣介石指定滕杰充任，因能力弱，不久即去職，由鄧悌繼任。鄧為留歐派領袖，本可勝任，但由於他個性強，與各派磨擦日甚，為賀衷寒聯合留日派所反對而下台，先由鄧文儀代理，後由賀衷寒繼任。賀為留俄派和政訓系統領袖，又曾留學日本，在復興社中頗占優勢，但接任書記長後亦因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驕傲自滿，有失蔣歡。西安事變時賀主張擁何（應欽）代蔣，對張學良用兵，蔣回京後不得不引咎請辭，由劉健羣繼任。但劉因非黃埔學生（滕、鄧、鄧、賀皆黃埔一期生），不久即被排走，由康澤繼任。復興社存在時間雖暫，而五易負責人，多為小宗派內部鬥爭所致。組織處長周復為黃埔軍校三期生，系留日派中心人物，周調監事會負責後，由第四期學生易德明接充。宣傳處長為鄧文儀；軍事處長為桂永清；特務處處長戴笠，副處長鄭介民，完全是特務原班人馬。原戴笠特務組織雖已具雛形，但經費未固定，純由蔣之特別費中開支，因為數頗巨，頗遭物議。復興社成立後，蔣特令將特務組織併入復興社中加設特務處，並規定它的人事調配和工作進行均歸蔣本人直接處理，不受復興社組織支配。

復興社的主要“使命”有三：第一，對付當時青年運動，打擊共產黨，把組織工作伸展到青年學生中去；第二，企圖將蔣介石的勢力伸入北方，打進雜牌部隊中，對雜牌部隊起分化收買作用；第三，對CC組織和CC的特務組織取監視態度。

劉健羣任復興社書記長時，曾建議收容失業的黃埔學生組織宣傳隊北上宣傳，發展復興社組織。他卸任書記長後，蔣即令其組織華北宣傳總隊（分若干大隊），率領北上，並以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的名義，將宣傳隊分配到華北各軍如宋哲元、馮占海等部中，每軍宣傳隊派有重要復興社分子主其事。鄧悌任